2021.3.29 星期一
主编｜李丛娇 版式｜杨薇 检校｜卫小林 王赛
海南日报

此次5号『祭祀坑』出土的残缺的金面具。

时隔三十多年后，三星堆遗址再现6个器物坑，又一次掀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大口尊、黄金面具、象牙、顶尊铜人像、青铜龙形配饰、玉琮等500余件文物相继出土，三星堆的这次“上新”再次刷新了公众的认知。

三星堆遗址“上新”啦

这些文物知识你知道吗？

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

小名片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畔。

1929年，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在清理门口的水沟时，无意间挖到一个堆满玉石器的土坑。

三星堆遗址由此被发现。

20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正式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6年1、2号祭祀坑被发现，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纵目人面具和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陆续出土，沉睡三千年的三星堆遗址一醒惊天下，开始为世人所知。

2021年，沉睡三十多年后，三星堆遗址又发现6个新的器物坑，伴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将再一次被揭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璧。

3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局部。

青铜重器再现 此次『上新』：青铜酒器圆口方尊

提起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粗眉杏眼的青铜立人和太阳轮形器等，不过这次三星堆遗址6个新器物坑中最早发现的铜器则是一件大口尊，经过初步的浮土清理后，测定这件铜尊通高70多厘米，敞口、长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肩部饰有兽首、鸟首，腹部似饰以兽面纹，此件大口尊是三星堆已出土的十余件铜尊中最大的一件。

尊是盛酒器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商代至西周中期。《史记·殷本纪》中记有：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作长夜之饮。殷商的王公贵族嗜好饮酒，酗酒成风自然耽于政事。西周武王灭商后，负责辅佐周王的周公担心这种饮酒的恶习会延续至周，让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不许酗酒，这篇告诫之辞也就是现在的古文名篇《酒诰》。商人的嗜酒在青铜器类别上就可见一斑，除却三星堆遗址已出土的器形铜尊和铜罍外，爵、角、斝、觥、方彝、卣、罍、觚、觯、瓿等都是商代常用的酒器。到了西周时期，铜器中的酒器就开始明显减少，像爵、角、尊、觥、卣、方彝、觚、觯和瓿到了西周早中期陆续消失不见，这应该与西周借鉴殷商嗜酒耽政有意减少青铜酒器的种类有关。

和大口尊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另外两件方尊，其中的一件圆口方尊还是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此前全国范围内出土的方尊口部和腹部一般都为方形，像这种圆口却方腹的极为罕见，唯一一件传世的圆口方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三星堆出土的这件相比，也是圆口、方腹、方足，腹部饰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饰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除却没有肩部的立鸟装饰，整体造型和纹饰极为相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牺首圆口方尊年代定为商晚期，根据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来看，三星堆的这件圆口方尊应也是商晚期铸造，那么埋藏这件铜尊的3号坑也就很可能是商代晚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测定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年代区间也属于商代晚期，所以3号祭祀坑和4号坑很可能为同一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指出圆口方尊上对称鸟的装饰是长江流域的特点，在北方地区基本不见，原来三星堆已发掘的十余件铜尊中8件有这种立鸟装饰，很明显，三星堆的部分青铜器是附属于长江流域青铜器大家庭的。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燕道诚之子捐赠的刻纹玉琮。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玉器和商周时中原的基本一致 此次『上新』：玉琮

时间回溯到七十多年前，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的文物不是让其蜚声世界的青铜器，而是玉石器。1929年，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在清理门口的水沟时，无意间挖到一个堆满玉石器的土坑，里面所埋的玉璧、玉璋等有数百件之多，由此唤醒了沉睡三千年的神秘三星堆。

在最新发现的三星堆4号坑中也可看到埋藏有玉琮和玉凿，考古工作者用竹签剔剥，已经将玉琮从4号坑取出。出土的玉琮经过灼烧而且长期埋压，口部已有轻微破裂，由于被浮土掩盖，尚不能确定其玉质是和田玉还是四川的龙溪玉，亦或其他的地方玉料。玉琮在此次发掘之前就曾经出土过，1951年燕道诚之子就曾捐赠给广汉县人民政府一件刻纹玉琮，这件刻纹玉琮呈半透明的黄绿色，器身内圆外方，中空呈短筒形，上下凸出的部分较短，外边四方转角圆浑，转角处上中下阴刻平行横线3组5条，与四方的竖线相交。从4号坑玉琮发掘的直播状况来看，新出土的玉琮整体形制上应比燕道诚家捐赠的那件略高，一侧似不太平整。玉琮一般被认为是祭地的礼器，外圆内方的形制可能包含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部上下相通的圆孔有“贯通天地”寓意。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从已发现的三星堆的玉石类文物来看，祭祀用的“六器”中玉璧、玉琮、玉璋、玉圭都有发现，虽然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应早于《周礼》的出现，但这些玉石器不具备实用性也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再加上火烧等祭祀痕迹，基本可以确定都为祭祀用的礼器。和很多三星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不同，这些玉礼器和中原商周流行的玉礼器基本是一致的。

此外三星堆文化出土的玉戈、玉斧、玉凿等形制的玉石器在同时期的商代遗址中基本都能找到类似器物。所以抛开青铜器和象牙等文物，仅从玉石器的角度来看三星堆遗址，它便会变得不再神秘，只是众多商代遗址中相对出色的一个。有意思的是，与三星堆遗址有着极为密切关系，同样位于蜀地并出土黄金面具的金沙遗址，则以五彩斑斓的玉器著称于世，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只能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予以解答了。

特色陶器透露先民生活习性 旧物新谈：陶三足炊器、陶盉、高柄陶豆

伴随着三星堆遗址6个新器物坑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土的文物也被大家关注起来。最有意思的便是那件陶三足炊器，因为它的口部是“大圈套小圈”，盘面分为两层，三个高大的袋状足都是中空的，可以盛水加热，宽大的盘面类似今天四川地区泡菜坛的坛沿，可盛水或置物，颇有点像以前老火锅的样子。有人猜测这是四川火锅的源头，三星堆的先民在使用三足炊器时也和今天吃火锅一样边煮边吃。当然，这件器物究竟是不是用于吃火锅尚待考证，但根据它的造型来看，确实很可能是古蜀人蒸煮食物的炊器。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同样有着三个大袋状足的陶盉，盉一般被认为是水器，常与盘配合使用，盘是盛水器，盉和盘配套行“沃盥之礼”，也就是用盉来倒水洗手，然后拿盘接水。不过王国维先生的《说盉》中认为盉是酒器，金文中的盉是象形文字，看起来像是手持麦杆以吸酒或水的器物。三星堆遗址中与陶盉一起出土的另有几个陶杯，有学者认为是一套完整的酒具，陶盉即是酒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尊、罍等都是酒器，所以三星堆遗址应该是存在酿酒的，另外陶盉中空的大袋足也确实方便作温酒器。这种袋状足的器物除了盉、陶三足炊器外，在夏商周时期，鬲、甗等器物也常见袋状足，这种袋状足一般中空，便于加热，为了提高耐热性，工匠制作这些器物时一般会有意识地加一些细砂，成为夹砂陶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和陶三足炊器推测都属于这种夹砂陶器的范畴。

高柄陶豆也是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豆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上部的浅盘一般较小，多认为是用于盛肉酱、腌菜等，较大的盘可能用于盛肉食或黍稷。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件陶豆柄部较高，这与先民们席地而坐的饮食习惯相关，高柄的设置，让拿取食物非常方便，属于生活中的实用器皿。此外据三星堆博物馆的介绍，高柄豆圈足上还刻划着一只眼睛，三星堆文物中，眼睛的图案十分普遍，可能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三星堆可能只是它的一个小侧面，三星堆先民的墓葬在哪里？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族群创造了如此灿烂的青铜文化？他们与中原商王朝又是怎样的政治关系？这些疑问只能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予以解决了。

陶三足炊器。

陶盉。

高柄陶豆。

三星堆遗址考古中的“黑科技”

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

在公众的认知里，考古人员在田野一般是拿着洛阳铲和小手铲作业，以“手铲释天书”。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开始助力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掘工作就展现了许多考古中运用的“黑科技”。

实验室考古模式

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所说，三星堆考古“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过去大部分的考古发掘基本都是在田野露天作业，前几年发掘的海昏侯墓也只是搭了简易大棚。实验室考古的典范“南海一号”沉船的发掘则是将遗迹整体打捞，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专门为其量身打造的“水晶宫”予以保护和研究。相比于“南海一号”来说，三星堆遗址考古则更进一步，直接就地建起实验室，通过多功能的考古操作系统将文物取出放入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再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仪器和方法就可以做初步的处理和保护。

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测量元素

除了一些大型的仪器设备外，像三星堆考古人员手持的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可以通过点测获取文物表面的元素组成和相对含量，虽然小巧但检测灵敏度高，方便携带，对于金属器的测量尤为准确。不仅是考古，做文物鉴定时也时常会用到，比如不少作假者铸造假银元多是用铁等银白色金属，这种金属币在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面前很容易原形毕露。

3D打印模型保护套

3D打印技术在此次发掘中也是大放异彩，通过3D打印制作出青铜器的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实际是还原了青铜器的制作过程，相比于以前用粘土模具覆盖在原文物上制作蜡模的技术，减少了对文物的污损，确实是文物保护的一大进步。

碳14测年采用加速器质谱仪

文物年代的测定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初步判定4号坑的年代分布区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碳14测年在考古上已运用多年，并不算是新科技，但这次三星堆考古在碳14测年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得更小。

不少公众感到疑惑，碳14测年可以直接对文物进行年代鉴定，为什么还需要文物鉴定专家呢。其实碳14测年是根据碳14的衰变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所以能测量的主要是一些有机物，像不含碳元素的无机物诸如陶瓷、金银器、铜器等一般是难以测年的。另外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测量的4号坑年代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很明显是存在一二百年误差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误差会越来越小。不过有些朝代如元朝不足百年，这种测年误差就会显得很大了，所以碳14测年在考古上一般是用于先秦时期，尤其是石器时代的测年运用广泛。

作为国内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考古工作，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很可能成为考古现代化发掘的一个里程碑，对于以后大型且重要遗迹的发掘工作必将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